

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

洪岩璧 赵延东

提要：本文从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出发，运用资本和惯习概念，探讨中国城市地区中产阶级与底层阶级在子代的教育投入和教养理念上的差异。通过对 2009 年一项全国城市地区中小学生及家长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子代教育方面，中产阶级父母在资本投入上有显著优势，但在家庭教养态度惯习上却和底层阶级父母无甚差别。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的阶级差异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占有的差异，中产阶级并未在阶级惯习上显著区别于底层阶级。所谓的阶层固化也主要是经济资本构筑的壁垒而已，不同阶层尚未在内在性情上呈现显著区隔。

关键词：中产阶级 阶层固化 资本 惯习 教养理念

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

——冯小刚电影《大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阶层分化和不平等问题日益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一方面，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群体，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群体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之势，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社会功能、政治态度和消费观念等方面也进行了诸多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在趋于固化、阶层壁垒日益森严、流动也愈加困难，也即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差异日渐凸显，甚至形成所谓的“断裂”。本文借用布迪厄阶级理论中的资本和惯习概念，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居民在子女教育上

^{*} 本研究得到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2242014S20080）。本文初稿曾在 2013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贵阳）“社会分层与流动”论坛和 2013 年 12 月广州南沙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的“定量社会科学论文研讨会”上宣读，作者感谢吴晓刚、吴愈晓、李煜、李骏、梁玉成、齐亚强和其他与会同仁，以及本刊匿名评审人给予的宝贵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

的资本投入和教养理念差异,探讨当前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中产阶层的形成状态,以及是否已形成阶层固化等问题。本文第一部分简述国内有关中产阶级的相关研究,聚焦于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和消费模式上所呈现的矛盾现象。第二部分运用布迪厄阶级理论(主要是资本与惯习概念)对子代教育过程中的资本投入和教养理念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阶层之间的差异模式。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变量和模型。第四部分报告和阐释统计分析的结果。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中国中产阶级

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①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期间虽有波折,但时至今日,这一研究主题已受到广泛关注(李春玲,2009)。虽然“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依然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周晓虹,2006),但学界更为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群体规模、态度以及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中产阶级的规模

李成(Li [Cheng], 2010: 5)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经济群体、政治群体和文化教育群体。其规模主要取决于界定的标准。^②虽然学者们各执一词,但常用的四个界定标准包括:具有较高和稳定的收入;从事专业性或管理类职业;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担负舒适生活水平的消费(Li [Chunling], 2010)。由于标准不同,学者们对中产阶级规模的估测也存在差异。如周晓虹(2005)以2005年月收入达到5000元、拥有白领职业并获得正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作为标准,认为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这5个大城市中,中产阶级的比例仅占11.9%。同样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为指标,李培林和张翼依据CGSS2006数据进行估测,认为在2006年,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大概占城市人口的1/4左右。他们还发现自我认同的“社会中层”更具有

① 本文不区分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和中间阶层,认为这些均是可以互换的称谓。

② 有关中产阶级界定标准的历史发展和探讨可参见张翼,2008;刘长江,2006。

稳定的社会意义,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李培林、张翼,2008)。但学者所界定的中产阶级与个体主观认同的“中层”以及公众对中产阶级的看法都相去甚远。大众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只能描述中产阶级上层,而非整个中产阶级(Li [Chunling], 2010)。^① 这些都表明,在快速转型的中国,中产阶级界限的清晰化和阶级认同尚处于形塑阶段和发酵期,而有关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和消费模式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论断。

(二)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消费模式

不少学者认为中产阶级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李强,2001;赵延东,2005),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社会结构“稳定剂”和社会矛盾“缓冲层”(李路路、李升,2007:16)。但质疑者指出,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张翼,2008),也有可能是“颠覆器”或者“异化器”(胡联合、胡鞍钢,2008)。^② 周晓虹(2005)认为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前卫、政治后卫”,^③他们是政府的坚定盟友,而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是民主转型的关键力量。个中原因在于,中国中产阶级除了保守性和激进性之外,还有一种依附性(李路路,2008)。

中国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迥异,这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趋于激进还是保守。新中产阶级可划分为国营经济群体和私营经济群体(也分别被称为“内源”和“外生”中产阶级),前者具有较强的代际延续性,与政府关系密切,在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方面相对保守;而後者的产生与形成都更具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政治意识上较为激进,消费意识上也相对前卫(李路路、李升,2007;Li [Chunling], 2010)。张翼(2008)也发现“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具社会批判意识,对政府和社会制度更持怀疑心理。但由于新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群体之一,因此依然是社会稳定的力量(李春玲,2011)。

虽然政治态度深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但不少学者都反对纯粹以收入和经济能力来定义中产阶级(Li [Cheng], 2010; Li [Chunling],

① 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民众和学者对“中产阶级”一词存在误读(周晓虹,2006)。

② 李成(Li [Cheng], 2010: 21)认为,社会政治稳定和民主本质上应当是相互弥补,而非相互矛盾的。

③ 这并非“中国特色”,米尔斯(1987)在《白领》一书的结尾就指出了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本质。

2010)。阶级的形成与再生产既有经济维度,也有文化维度,两者缺一不可(克朗普顿,2011:161)。调查显示,就传媒接触而言,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阶层最显著的差异体现为媒介接触中的书刊接触,而非电视、报纸和网络接触。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图书和刊物这一类更冗长、更具有知识容量的信息载体,而且不同阶层阅读的图书杂志也体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周晓虹,2005:185;郭小平,2009)。根据这些消费分层现象,李强(2011:296-297)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文化消费已经从不同阶层趋同的“文化混合模式”向具有阶级特征的文化模式转变。

上述关于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和消费模式的经验研究中,存在两种相互龃龉的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上虽渐具规模,但并非一个具有统一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李培林、张翼,200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经济分层走向文化分层,阶层结构日益定型化,甚至产生了“断裂”(孙立平,2002;李强,2004)。如何来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认同的形成需要共同的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阶级经历强调认同是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反映,源于同客观世界的长期互动;而阶级意识则强调阶级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关注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汤普森,2013)。换言之,从马克思的“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之间,需要个体的经验作为中介桥梁,否则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自动地转化为阶级认同。因此,理解阶级的形成需要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对立,而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式。

二、从资本到惯习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探讨分层秩序的动态变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天然实验室”。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转向“经济分层”(李强,1997)。同时,在经历多次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之后,上层阶级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几乎已销声匿迹(李强,2011:295)。这为我们在改革后的30多年中观察文化分层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而布迪厄(Bourdieu, 1984)强调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惯习的分层理论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一)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资本和惯习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散见于其著作和文章之中(Weininger, 2005: 83),但其理论并非无章可循。在布迪厄看来,如果存在一个适用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则的话,那就是“区隔”原则。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任何个体、团体和阶层都无法摆脱这一区隔逻辑(Bourdieu, 1984:xii)。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区隔主要在物质关系和符号关系两个方面展开,即客观化的地位,以及内在于个人的观念和鉴赏力(不同的组合形成了“惯习”)。前者限制个体的观念和行动,后者是个体对生活世界的内在体验和积极建构(Wacquant, 2013)。因此,布迪厄宣称阶级是由其“存在”(being)和“被感知到的存在”(being-perceived)同时定义的(Bourdieu, 1990:135)。

布迪厄把阶级定义为一群拥有共同性情和相同外在生存条件的个体,提出用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等四类“资本”来分析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外在生存条件,用“惯习”分析内化于心的性情。^①在布氏看来,现代社会是由不同“场域”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社会空间”。个体和阶级运用各种资本在社会空间中互相斗争,保卫或夺取有利的社会位置;而相同社会位置会带来相同或类似的生活处境,从而形塑相似的阶级惯习(刘欣,2003)。资本、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阶级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本文重点关注资本和惯习这两个概念。

布迪厄把资本定义为“一组可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Bourdieu, 1984:114),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在社会空间中,阶级形成的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是资本量、资本构成比例和位置演变的历史轨迹。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本,布迪厄主要以这两类资本占有量的多少来定位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Bourdieu, 1984:114)。^②由于不同资本的获得所需的劳动时间(labor time)^③存在差异,其再生产性(reproducibility)也是不同的,即传递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资本作为阶级区隔壁垒的强度也存在差异。与经济资本相比,文化资本的传递更为隐秘、风险更大,传递更为困难。但文化资本一旦获得,其作为阶层壁垒的作

① 布鲁贝克(Brubaker,2004)认为这是布迪厄建构的两个理想类型。

② 因此这两种资本的规模与结构差异可以解释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在生活方式和性情上的不同(参见李强,2011:285)。

③ 布迪厄用广义的“劳动时间”作为资本之间转换计算的单位(Bourdieu, 1986)。

用也更为牢固。

然而,阶层的划分不仅源于经济和外在社会条件(资本),也有赖于一种与特定社会位置相联系、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即“惯习”(habitus)的形成(Bourdieu, 1984:170)。惯习是一个社会性的性情(disposition,或译为“秉性”)系统,内化于个体日常行为之中。它是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认知和动机系统,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知觉和行动(刘欣,2003)。布迪厄提出惯习这一概念是为了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所固有的缺陷:惯习联结了社会结构和实践行动,它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形塑,同时又对实践行动起规范作用(Brubaker, 2004:43)。^①

在布迪厄看来,惯习作为一组后天获得的思想、行为和趣味模式,其获得并不一定是蓄意或有意识的,但是占有相同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的个人往往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性情系统(参见克朗普顿,2011:172-174)。虽然同一阶级的成员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一阶级的成员会比其他阶级成员更有可能遭遇到了本阶级成员经常遇到的情形(Bourdieu, 1990:60)。所以克朗普顿(2011:172)说“各种各样的资本组合构成惯习”。惯习是特定阶级一系列客观规范的产物,因此它能产生所有合乎这些规范的、“合理的”以及符合常识的行为(Bourdieu, 1990:56)。在此基础上,布迪厄指出,由于经济条件不同,产生了两种基本的阶级品味,即追求奢侈、自由的品味,和追求必需品的品味。前者是具有良好的经济状况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惯习的体现,后者是工人阶级惯习的体现(刘欣,2003)。生活方式(地位)显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异,而联系生活方式和阶级位置的概念就是“惯习”;惯习体现在消费等领域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之中,从而逐渐在阶级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个体之间形成了符号边界,进一步合法化阶级结构。

同时惯习又是历史的产物,是身体化的历史。它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即阶级位置演变的轨迹)形成的,尤其受早期经验影响甚巨,包括两性分工、家庭用品、消费模式和父母—孩子关系等家庭经验(Bourdieu,

^① 刘欣(2003)认为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歧之一在于,布迪厄既重视阶级的现实存在,又看到其历史积累(体现在“惯习”上)。

1990:54)。因此,惯习并不是简单地由各类资本直接决定的。譬如,去参加音乐会并不代表所有的听众都占有了音乐文化,惟有熟稔这些音乐作品内在逻辑的观众才是真正的占有者(Bourdieu, 1984:2-3)。资本就像是音乐会的门票,而惯习则是对音乐的欣赏能力。^①即使有了门票,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者能立刻真正地欣赏音乐。也就是说,惯习和资本之间很可能存在错位现象。^②

因此,惯习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一样,都是不同的团体和阶级用于建构相互之间边界的要素。资本更多地参与社会边界的构筑,而惯习则与符号边界的建构密切相关(范晓光,2012)。但是资本和惯习所构筑边界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是存在差异的。惯习需要在历史中积淀形成,因而它不能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在旦夕之间获取或习得。与资本相比,惯习的获取时间更长、阶级渗透性差,因此其作为阶级壁垒的效用更为坚固,不能被轻易突破。

布迪厄的资本和惯习理论为我们透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形成与变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通过分析当前中国不同阶层在资本和惯习维度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阶级结构形成处于何种阶段。孙立平(2008)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开始了阶层定型化的进程,其主要标志有四点:阶层边界开始形成,包括有形的居住边界和无形的生活方式、文化边界;内部认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断裂社会”命题的核心之一就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发生断裂,这条主要的“断裂带”就是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种种分歧和对立之根源(孙立平,2002)。但值得追问的是,由贫富差距所引起的“断裂”是否已经导致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断裂”?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进身之阶,是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通过比较教育再生产过程中,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之间在资本和惯习占有上的异同,我们可以尝试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① 这种欣赏能力也被认为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但我们仅以此来比喻说明资本和惯习之间的关系,无意于争论文化资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② 布迪厄在讨论阶级惯习和个人惯习的关系时指出,个人在过往经验中形成的惯习可能不符合当前所属阶级的惯习,这种错位现象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尤为凸显。布迪厄称这种错位现象为“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参见 Bourdieu, 1990:60-62)。

(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布迪厄非常关注教育再生产的研究,他在研究中通过三个方面来定义个人的阶级地位:在经济社会等级中的地位、阶级惯习、文化和社会资本(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108-109)。第一和第三因素无疑属于布氏所说的资本,为外在条件因素;第二因素是惯习,属于内在性情。外在生存条件(资本)和内在性情系统(惯习)是支撑布迪厄阶级定义的两个核心维度。但惯习被认为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只能被解释性地理解(Weininger, 2005:93)。布迪厄主要是通过研究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行为来展现其背后的惯习。但布氏也意识到,多数文化消费活动都涉及到经济支出,如到剧院看演出就要不菲的门票(Bourdieu, 1984:116)。本文第一部分对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和消费模式的探讨也指出了经济资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把布迪厄阶级理论引入定量研究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找到能代表性情和惯习但却不直接受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影响或干扰的指标。我们认为,在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研究中,教养方式和教养理念是较为合适的一个惯习指标。

文化资本是一种个人或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一般来说它与某个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或符号密切相关(Jæger, 2011)。因此,拥有文化资本的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运用这些资本来提升其相对于他人或他群的优势,从而更好地获取社会资源和提升社会地位。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包含身体化、实物和制度化三种形态,同时文化资本的累积涵盖了整个社会化过程,因此是最为隐蔽的资本传递渠道(Bourdieu, 1986)。后来的学者运用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但文化资本的操作化定义则是众说纷纭。定量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孩子或父母参与高级文化活动情况,譬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或听音乐会。这一测量指标也被称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Byun et al., 2012)。但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操作化过于狭窄,又提出了阅读习惯与文学环境、家庭教育资源、课外活动等指标(Jæger, 2011)。经验研究表明,这些文化资本指标都对子代的学业成功和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相关综述参见 Jæger, 2011)。其中,家庭藏书量是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都有显著正效应,并在诸多国家都得到了验证(Evans et al., 2010;赵延东、洪岩璧,2012)。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孩子往往能更多地参与到高级文化活动中(Sullivan, 2001; Xu & Hampden-Thompson, 2012)。西方国家的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参与高级

文化活动越多,孩子的学业成绩就越好(Jæger, 2011),但这一关系是否在所有社会都成立还有待商榷(Byun et al., 2012)。

由以上综述可见,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有密切联系,文化参与更多受到经济资本影响,但参与并不等于文化品味;后者更多受到社会化过程中惯习作用的影响(Yaish & Katz-Gerro, 2012)。我们把藏书量、孩子参与高级文化活动情况和让孩子参加补习班这三个变量作为家庭资本投入的测量指标,以区别于下面将提到的教养方式和理念等惯习指标。家庭文化资本投入在不同阶层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形成研究假设1。

假设1: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的资本投入上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相比于底层阶级的家长,中产阶级家长在藏书量、孩子参与高级文化活动、让孩子参加补习班这三个资本指标上具有显著优势。

(三)教养理念的阶层分化

家长的教养理念作为惯习,受经济资本制约较少,^①同时又与儿童的自尊、主观幸福感、冒险精神和教育获得等存在密切关系。心理学研究中,鲍姆里德(Baumrind, 1971)最早提出了常见的教养方式分类,即“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和“消极型”(permissive)三类。马科布和马丁(Maccoby & Martin, 1983)把鲍姆里德的三个分类区分为责任感(responsiveness)和苛求程度(demandingness)两个维度并进行交互分类,得到四种教养方式:“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indulgent)和“忽视型”(neglectful)。而兰博朗等(Lamborn et al., 1996)则把教育方式分为三类:“家长说了算”、“孩子作主”和“共同作主”,庞雪玲等人(Pong et al., 2005)又增加了第四类“含糊放任型”,即家长和孩子都很少做决定。该分类基本与马科布和马丁的四分类相对应。大量经验研究表明,与专制型和消极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小孩更为成熟、独立,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陈陈, 2002)。国际比较研究指出,权威型教养更为有利这一论断具有一定普适性,超越了种族和文化边界(Pong et al., 2010)。

① 家长花在孩子身上时间长短深受经济资本的影响,例如母亲如果专心照顾孩子就无法进行全职工作,从而损失了“劳动时间”(Bourdieu, 1986)。因此,教养理念强调相互沟通时的形式。

西方心理学界主要关注个人心理特征,因此有心理学家批评当下的教养方式研究过于关注个人心理变量,忽略了阶级等其他重要的情境因素,而知道一个孩子的阶级出身往往比了解其早期心理特征能更好地预测其未来状况(Frank, 2013)。拉鲁(Annette Lareau)运用布迪厄的资本—惯习分析框架,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家庭教养方式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剖析。她发现中产阶级采取的是“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模式,既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也会毫不犹豫地干预孩子的活动;而工人阶级则采取“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natural growth)模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放羊式”教育,不给孩子组织活动,而把很多教养孩子的责任委托给学校。虽然在家庭内部这两种教养方式各有利弊,但在家庭外的公共生活中,相比于工人阶级孩子,中产阶级孩子在生活中占有明显优势,因为“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里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拉鲁,2010:242)。

拉鲁对教养方式的二元区分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其一,不同阶层父母在拓展孩子课外活动方面的投入存在差异,中产阶层的孩子参加正式的、由成人带领的活动(如音乐会等)较多。其二,不同阶层父母与学校及老师的互动模式存在差异。其三,家长与孩子的互动模式也有所不同,底层家长更多地采取命令式口吻,而中产阶层家长更多的是与孩子商量(Cheadle, 2008)。其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方面都属于教育的资本维度(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第三个方面则属于教养惯习范畴。采用“协作培养”模式的中产阶级家长在子女教育上较多秉持权威型教养方式,而采用“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的底层阶级家长则多倾向于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拉鲁认为教养方式在很多时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她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来指称这种状态。不同的教养方式为“儿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拉鲁,2010:272)。

国内有关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对家庭经济地位如何通过教养方式影响儿童教育获得这一过程,虽有相关理论译介(王晓阳,1993;商冲晨、莫书亮,2010),但经验研究并不多。从阶级分化的角度来研究教养方式差异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则更少。根据以上综述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确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固化现象,那么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子女教养理念上就应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结

合上文的“断裂”社会或阶层定型化命题，本文形成研究假设 2。

假设 2：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的理念上存在明显阶层差异，作为惯习指标，中产阶级家长更多地秉持权威型的教养理念，而底层家长更多地秉持专制型或放任型的教养理念。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2009 年开展的“全国青少年科技素养调查”。该项目受国家科技部委托，由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实施。调查样本总体是全国 286 个城市（指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市辖区，不含下辖的县和县级市）的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在校学生。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和解释仅限于中国大中城市居民群体，也包括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以市辖区范围内的在校学生数为依据，先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方法，在全国所有市辖区中抽取了 128 个市辖区，然后在每个区依系统随机方法抽取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再在每所小学中随机抽取一个四年级班，在每个初中随机抽取一个初二班，最后选取班里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每个学生填答一份问卷，并带一份家长问卷由监护人填答完成。最终实际调查完成的样本包括 20 个省市的 61 个四年级班和 57 个初二班，有效学生问卷、家长问卷分别为 6079 份和 6028 份。

由于部分家长问卷的填答者不是父母，所以我们删除了非父母填答的个案，此外也删除了孩子性别变量缺失的个案，余下的分析样本规模为 5411。由于存在缺失数据的个案比例为 19%，因此对分析样本中的缺失值采用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的处理方法。我们在多重插补计算模型中纳入所有统计模型中用到的变量，插补缺失值后得到 10 个独立的数据集，分别对这 10 个数据集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再把分析结果汇总。缺失值处理和统计分析皆采用 Stata 12.0 进行。本文所有的描述统计和模型输出皆为缺失值处理后的计算结果。多重插补后的计算结果与采用直接删除法（case-wise deletion）得到的结果基本类似。

(二)研究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分为资本和惯习两组。资本因变量包括文化活动参与情况、家庭藏书量和课外补习情况。(1)文化活动参与情况是一个计数变量,询问了儿童最近一年是否去过如下地方: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植物园、动物园、图书馆、少年宫和美术馆。对于每一个场馆,去过计分为1,否则为0,然后把8项分数相加得到文化活动类别参与次数。因此该变量的取值为0-8之间的整数。(2)家庭藏书量为连续型变量,取值为每个类别选项的中点值(0=0本,5=1-10本,15=11-20本,35=21-50本,75=51-100本,150=101-200本,350=200本以上)。(3)课外补习情况为二分变量,1=参加过课外补习,0=没有参加过课外补习。课外补习包括两种形式:请家教和参加课外辅导班(含作文、奥数辅导等文化类,以及科技和艺术类)。

惯习因变量代表是家长的教养理念,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态度题进行测量: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你是否同意以下几种说法?(1=完全同意,2=比较同意,3=不太同意,4=不同意)

A. 孩子顶撞老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B. 孩子上完课,做完作业后,再想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家长不用管。

C. 和孩子有关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和孩子商量一下。

惯习因变量都是定序变量(1-4指代从完全同意到不同意)。A项选择同意,则为专制型倾向;B项选择同意,则为放任型倾向;C项选择同意,则为权威型倾向。

2. 自变量

职业分层。主要根据李春玲(Li [Chunling], 2010)对中产阶级的分类稍做改动,分中上中产阶级、中下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中上中产阶级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经济业务人员、私营企业主(雇工8人或以上)。中下中产阶级包括:基层管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技术工人、军人警察消防人员、个体户/小业主(雇工 8 人或以下)。底层阶级包括：商业与服务人员、非技术工人、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

主观分层。问卷询问被访家长“你觉得你们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当地属于哪个阶层？1. 上层, 2. 中上层, 3. 中层, 4. 中下层, 5. 下层, 6. 无法分层, 7. 不知道”。我们把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合并成一类“中上和中层”，然后分别是“中下层”和“下层”，最后把“无法分层”和“不知道”单列一类。^①

教育。把被访家长按照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本科及以上)分成两类(0 = 否, 1 = 是)。

家庭人均月收入。取自然对数之后放入模型。

此外还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孩子年级(0 = 小学, 1 = 初中)、被访家长性别(0 = 母亲, 1 = 父亲)、孩子的民族(0 = 少数民族, 1 = 汉族)和家长户籍所在地(0 = 农村, 1 = 城市)。

根据因变量特征,我们分别采用了负二项式(negative binomial)回归、一般线性回归(OLS)、logistic 回归和定序变量(ordinal logit)回归模型。文化活动参与情况是计数变量,对于计数因变量,一般使用泊松(poisson)回归;但如果存在过度离散(over-dispersion,即方差大于均值)现象,负二项式回归就要比泊松回归更合适(Long & Freese 2001: 223 - 250)。^②藏书量可以看作连续型变量,故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是否参加补课为二分类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教养态度因变量皆为定序变量,都采用 ordinal logit 回归。^③由于抽样过程中采取了整群抽样,因此在所有模型中,我们都控制了整群效应(cluster effect)。^④有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参见表 1。

① 分析发现,“无法分层”和“不知道”群体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介于“中下”和“下层”之间。但又有部分个案的职业属于管理和专业技术阶层,因此把这一群体单列,但在文中不做讨论。

② 对过度离散的一个检验方法是：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中,如果离散系数(dispersion coefficient)估计值统计显著,就说明存在过度离散,负二项式回归模型比泊松回归模型更契合数据的分布;如果不显著,则无明显过度离散,使用泊松回归便可。本文中参加文化活动次数模型的负二项式回归结果和泊松回归结果基本接近。

③ 我们尝试把教养态度设置成“同意—不同意”的二分变量,构造 logistic 回归模型,但结果和本文报告的 ordinal logit 模型结果大同小异。

④ 我们对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学生分开做了回归模型,但两组模型结果呈现的模式基本一致,仅存在细微差别。因此为简便起见,本文做了合并处理。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			均值/比例	
孩子年级(0 = 小学,1 = 初中)			. 491	
孩子性别(0 = 女,1 = 男)			. 502	
孩子民族(0 = 少数,1 = 汉)			. 945	
家长的主观阶层认同				
中上层(中上 + 中层)			. 417	
中下层			. 260	
底层			. 123	
无法分层/不知道			. 201	
父亲填答问卷(0 = 母亲)			. 427	
家长的户口(0 = 农村,1 = 城镇)			. 620	
家长受过高等教育(0 = 不是,1 = 是)			. 213	
家长的职业分层			. 189	
中下层			. 288	
底层			. 523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6. 389(1. 063)	
参加文化活动类别的数量			2. 873(2. 012)	
家庭藏书量			73. 852(103. 314)	
教养理念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A. 顶撞老师不可容忍	52. 18%	17. 09%	12. 31%	13. 20%
B. 让孩子做自己的事	8. 18%	25. 10%	43. 58%	23. 13%
C. 和孩子商量相关的事	50. 91%	38. 18%	8. 46%	2. 46%
样本量			5411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

从表 1 可知,职业阶层与主观分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如果仅根据填答问卷的家长的职业来判断,样本中属于底层(非技术产业工人、农民、服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无业失业人员)的被访者占一半以上,属于中上阶层的占 19%,中下阶层占 28%。但在主观分层中,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 26%,底层占 12. 3%,而主观中上层和中层占 41. 7%(其中中上层只有 4. 7%,37% 自认为是中层)。^① 所以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同时纳入了职业分层和主观分层变量,来考察这两类变量的不同

① 但中国主观中层的比例仍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赵延东,2005)。

作用。^① 表 1 最后一部分是教养理念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总体情况是同意 A 和 C 项、不同意 B 项的家长居多。在“顶撞老师不可容忍”方面,专制型家长居多;在“和孩子商量相关事情”上,权威型家长居多;在“做完作业后,让孩子做自己的事”方面,放任型家长较少。^②

四、计算结果：资本和惯习的阶层差异

表 2 中的模型 1-3 显示了阶层因素对文化资本各指标的影响,表 3 的模型 4-6 显示了阶层对教养惯习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模型(表 2)中,纳入父母双方的变量更为合适,但为了方便模型比较,我们在资本和惯习模型中纳入了完全相同的变量。^③

表 2 影响家庭文化资本投入因素的回归分析
(参加文化活动的负二项式回归、藏书量的 OLS 回归
以及补课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参加文化活动情况	模型 2 藏书量	模型 3 参加过补课
	B(S. E.)	B(S. E.)	B(S. E.)
常量	-.341(.166) *	-37.62(12.42) **	-3.961(.504) ***
初中学生 ^a	-.256(.049) ***	13.598(4.174) **	-.659(.144) ***
男性学生 ^b	-.054(.018) **	-.575(2.638)	-.234(.062) ***
汉族学生 ^c	.097(.065)	6.654(5.351)	.355(.186)

① 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分别纳入职业阶层变量和主观阶层变量,但模型结果所呈现的模式和同时纳入并无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保持简洁,我们使用了同时纳入两类阶层变量的方法。

② A、B 两项上的比例似乎显示家长的教养理念在不同情境中存在差异,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们的测量题干太少,难以完整地测量家长的教养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很多家长可能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教养理念,而是受到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念的影响。

③ 即使在资本模型中同时纳入父母双方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并不大。此外,一位匿名评审人提出不同阶层回答家长问卷的父母比例可能存在差异,而这又进一步影响其教养理念。因此我们以父亲职业分层为基准,来看填答问卷家长的性别。父亲属于职业中上层时,母亲填答比例最高,为 62%;父亲属于职业中下层,母亲填答比例为 58%;父亲属于职业底层,母亲填答比例为 54%。可见,不同阶层家长在填答问卷上存在性别差异。但表 3 模型中家长的性别对教养理念并没有显著影响,即使把家长分性别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和表 3 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即不管是在父亲之间还是母亲之间,教养理念仍然不存在阶层差异。所以,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不会对本文结论有所影响。

续表 2

变量	模型 1 参加文化活动情况	模型 2 藏书量	模型 3 参加过补课
	B(S. E.)	B(S. E.)	B(S. E.)
父亲填答问卷 ^d	-. 048(. 021) *	-3. 574(2. 796)	-. 353(. 079) ***
家长城镇户口 ^e	. 181(. 034) ***	19. 829(3. 313) ***	. 772(. 097) ***
家长高等教育 ^f	. 055(. 028) *	57. 332(4. 470) ***	. 415(. 115) ***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 162(. 021) ***	8. 638(1. 514) ***	. 504(. 065) ***
家长职业中上层 ^g	. 126(. 029) ***	24. 620(4. 757) ***	. 423(. 117) ***
家长职业中下层 ^g	. 084(. 028) **	7. 979(3. 281) *	. 368(. 079) ***
家长主观中上层 ^h	. 168(. 038) ***	23. 416(3. 919) ***	. 154(. 125)
家长主观中下层 ^h	. 076(. 039) *	4. 320(4. 340)	. 176(. 126)
家长主观无法分层 ^h	. 109(. 037) **	8. 138(4. 224)	-. 015(. 118)

注:(1) * p<0. 05, ** p<0. 01, *** p<0. 001, N=5411。(2)各变量的参照类如下:a. 小学生,b. 女性,c. 少数民族,d. 母亲,e. 农村户口,f. 未受过高等教育,g. 职业分层属于底层,h. 主观底层。(3)表格中数字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是控制班级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

在资本模型(模型 1-3)中,阶层变量都显示出强烈的影响。家庭收入、教育是定义中产阶级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仅讨论家庭收入、家长教育以及家长阶层地位的作用,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暂不做讨论。家庭人均月收入能显著提高孩子参加文化活动类别的次数,显著增加家庭藏书量,显著提升孩子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家长受过高等教育在三个模型中也都具有显著正效应。家长的职业阶层也都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从事底层职业的家长而言,从事中上和中下阶层职业的父母都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提供更多的家庭藏书和参加课外补习的机会。就主观分层而言,相比于自认为属于底层的家长,主观中上层和中下层的家长都能让孩子更多地参与文化活动;主观中上层的家长能提供更多的家庭藏书,主观中下层和底层家长在提供藏书数量上无显著差别。主观阶层之间在是否参加过补课方面也无显著差别(模型 3)。因此,研究假设 1 基本得到了证实,即相比于底层,中产阶层家庭在教育的资本投入上具有显著优势。

表 3 教养理念的 Ordinal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顶撞老师不可容忍	让孩子做自己的事情	跟孩子商量有关事情
	B(S. E.)	B(S. E.)	B(S. E.)
初中学生 ^a	-. 227(. 068) **	. 074(. 070)	-. 005(. 064)
男性学生 ^b	-. 007(. 051)	. 195(. 043) ***	. 112(. 059)
汉族学生 ^c	. 131(. 154)	. 106(. 136)	. 096(. 130)
父亲填答问卷 ^d	. 058(. 056)	-. 022(. 058)	. 105(. 059)
家长城镇户口 ^e	-. 051(. 065)	-. 234(. 073) **	. 040(. 064)
家长高等教育 ^f	. 231(. 060) ***	-. 303(. 081) **	. 072(. 070)
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数	. 010(. 033)	-. 050(. 028)	. 028(. 035)
家长职业中上层 ^g	. 105(. 083)	. 079(. 088)	. 183(. 088) *
家长职业中下层 ^g	. 014(. 066)	-. 048(. 066)	. 036(. 066)
家长主观中上层 ^h	-. 038(. 095)	-. 073(. 093)	-. 018(. 090)
家长主观中下层 ^h	-. 079(. 098)	-. 012(. 096)	. 152(. 098)
家长主观无法分层 ^h	-. 002(. 100)	. 002(. 091)	. 140(. 097)
切点 1	. 208(. 305)	- 3. 177(. 236) ***	. 331(. 274)
切点 2	1. 101(. 309) ***	- 1. 441(. 216) ***	2. 403(. 284) ***
切点 3	2. 015(. 323) ***	. 486(. 219) *	3. 986(. 308) ***

注：(1) * p < 0. 05, ** p < 0. 01, *** p < 0. 001, N = 5411。(2) 各变量的参照类如下：a. 小学生, b. 女性, c. 少数民族, d. 母亲, e. 农村户口, f. 未受过高等教育, g. 职业分层属于底层, h. 主观底层。(3) 表格中数字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中为标准误, 是控制班级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

但在教养惯习模型(模型 4-6)中, 阶层诸变量对于教养理念并无显著的一致影响。家庭收入对三种教养理念均无显著影响。惟有在模型 4 和模型 5 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会更倾向于不同意“顶撞老师不可容忍”这一说法, 并更可能让孩子在做完作业后做自己的事情。模型 6 中, 相比于职业底层家长, 中上层父母在“跟孩子商量有关事情”上结果显著, 但却更倾向于不同意这一说法; 也即中上层父母比底层父母的权威型倾向更弱。其他的职业阶层和主观阶层分类均不显著。由此可见, 阶层相关变量对教养理念的影响微弱, 偶有显著影响, 也跟假设的方向相违背。因此, 在如何教养孩子的理念惯习方面, 中产阶层(无论中上还是中下阶层)和底层基本不存在差别。所以, 研究假设 2 并未得到证实。

五、讨 论

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为我们更好地观察和分析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良机。本文根据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在家庭教育传递过程中区分了资本和惯习两类指标,前者包括文化活动参与和文化物质资源,后者侧重主观态度和性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中国城市居民中,不同阶层在资本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中产阶层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优势;但在惯习维度上,阶层差异甚为微弱。换言之,就教养惯习层面而言,中国城市居民没有呈现出西方那样的中产阶层以权威型教养为主、底层以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为主的分化模式。

研究者认为在市场转型的前20年中,阶层固化的程度还不足以影响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行(张乐、张翼,2012)。近年来,李强(2004;2011:296)提出当前中国已经形成明显的文化分层,阶级结构趋于定型化。孙立平(2002)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断裂社会”命题。然而本研究发现,显著的阶层区隔仍主要体现在与经济资源高度关联的外在资本维度,而在内在层面的惯习上,中产阶层并未显著区别于其他阶层。我们认为,当前所谓的文化分层主要还是一种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本的消费分层,而非品味惯习上的分化。当前的很多中国“中产阶级”只是在收入上日益富足,而在态度、惯习方面并未显现出阶层独特性。不可否认,不少中产阶级成员已经习得了独特的“个体惯习”,但整个阶层并未形成较为稳定的“阶级惯习”。

职是之故,中国社会离阶层固化尚有一段距离,只是处于定型化过程之中。^①我们认为当前划分阶层的壁垒主要是由金钱等外在条件构筑的,而阶层态度和认同等内在藩篱的建构尚在进行之中,并无凝固的痕迹。冯小刚的电影台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很好地诠释了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处境。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维度和惯习维度是相互分离的,我们也不怀疑经济资本在当前中国的主导作用。韦伯(Weber,

^① 孙立平(2008)指出“不是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完全定型下来了,而是说处于定型化过程中”。本文的分析结果与这一判断相符。

1946:187)指出财产并非地位资格获得的必备要素,但从长远来看,财产无疑又是一个极其稳定的要素。布迪厄指出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的根基,但仅仅是在分析的意义上来说是如此(Bourdieu, 1986)。因为经济资本向其他资本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资本条件形塑惯习更需要时间。布迪厄指出,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流动并不是随机的,一方面,个体受制于形塑这一空间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个体也运用自己的惯性来反抗这些力量(Bourdieu, 1984:110)。经济因素在当前中国无疑具有决定性力量,但是一个稳定的、具有区隔度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阶层壁垒的泾渭分明尚需时日。个体的惯性需要在结构之中浸淫更长的时间才能形成与阶层地位相符的“惯习”。因此在探讨消费和政治态度之外,我们应该把中产阶级研究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他们在当前转型社会中的生活机遇,以及对这些机遇及结构的认知。

作为一项尝试性研究,本文自然存在不少局限。首先,惯习维度的阶层无差异模式可能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内部成分过于复杂。正如王建英和戴慧思(Wang & Davis, 2010)所说,对于快速转型的中国,大阶级分析模式并不适用于中产阶级分析,更为精细的微观阶级分析可能有利于进一步解析不同群体的人生机遇和态度。同样,研究者也认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已日益碎片化,难以形成具有集体意识的阶级认同(克朗普顿,2011:186)。其二,本研究中对教养理念的测量还比较粗糙,而且教养理念和真正的教养方式实践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日常的教养实践数据能更好地体现家长日用而不知的“惯习”。这都有待以后相关数据的搜集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再生产》,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陈,2002,《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透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范晓光,2012,《阶级分析中的边界渗透研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论文。
- 郭小平,2009,《论阅读分层与高端杂志的中间阶层定位》,《中国出版》第1期。
- 胡联合、胡鞍钢,2008,《中产阶级:“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他》,《政治学研究》第2期。
- 克朗普顿、罗丝玛丽,2011,《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拉鲁,安妮特,2010,《不平等的童年》,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春玲,2009,《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关注点的变化》,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1,《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第2期。
- 李路路,2008,《中间阶级的社会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李强,1997,《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01,《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2004,《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2011,《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长江,2006,《“中产阶级”研究:疑问与探源》,《社会》第4期。
- 刘欣,2003,《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米尔斯,C. 赖特,1987,《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商冲晨、莫书亮,2010,《家庭微系统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第6期。
- 孙立平,2002,《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第2期。
- ,2008,《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第3期。
- 汤普森,201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王晓阳,1993,《国外关于不同阶层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张乐、张翼,2012,《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青年研究》第1期。
- 张翼,2008,《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赵延东,2005,《“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
- 赵延东、洪岩璧,2012,《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周晓虹,2005,《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
- Baumrind, Diana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of Research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2004, “Rethinking Classical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In D. L. Swartz & V. L. Zolberg (eds.), *After Bourdieu*. Dordrecht: Kluwer.
- Byun, Soo-yong, Evan Schofer & Kyung-keun Kim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3).
- Cheadle, Jaboc E. 2008, “Educational Investment,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ren’s Math and Reading Growth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Third Grad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1).
- Evans, M. D. R., Jonathan Kelly, Joanna Sikora & Donald J. Treiman 2010, “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Books and Schooling in 27 Nation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8.
- Frank, Robert G. 2013, “Psychology Reconstructed.” *PsycCRITIQUES* 58(17).

- Jæger, Mads Meier 2011, “Does Cultural Capital Really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New Evidence from Combined Sibling and Panel Dat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4).
- Lamborn, S. D., S. M. Dornbusch & L. Steinberg 1996,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Context as Moderator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Decision Mak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s.” *Child Development* 67.
- Li, Cheng (ed.) 2010,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i, Chunling 2010, “Characterizing China's Middle Class: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s and Multiple Identities.” In Cheng Li(ed.), *China's Emerging C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ong, J. Scott & Jeremy Freese 2001,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College Station, Tex.: Stata Press.
- Maccoby, E. E. & J. A. Martin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al-Child Interaction.” In E.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IV).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Pong, Suet-ling, Lingxin Hao & Erica Gardner 2005, “The Role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School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 Asian and Hispanic Adolescen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6.
- Pong, Suet-ling, Jamie Johnston & Vivien Chen 2010,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Asian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 Insights from the US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4.
- Sullivan, Alice 2001,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35(4).
- Wacquant, Loic 2013, “Symbolic Power and Group-Making: On Pierre Bourdieu's Reframing of Class.”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3(2).
- Wang, Jianying & Deborah Davis 2010, “China's New Upper Middle Class: The Importance of Occupational Disaggregation.” In Cheng Li(ed.), *China's Emerging C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Weber, Max 1946, “Class, Status, Party.” In H. Gerth & C. W. Mills(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nger, Elliot B. 2005, “Foundations of Pierre Bourdieu's Class Analysis.” In Erik Olin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Xu, Jun & Gillian Hampden-Thompson 2012, “Cultur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Mobility, Cultural Resources, or Trivial Effec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6(1).
- Yaish, Meir & Tally Katz-Gerro 2012, “Disentangling ‘Cultural Capital’: The Consequences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for Taste and Particip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2).

作者单位：洪岩璧（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赵延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 可